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 | (1894-1949)
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陈矩弘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1894—1949）”

（项目编号：11JCTQ01Z）研究成果

浙江 | (1894-1949)
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陈矩弘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研究的时间界限为198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历史。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浙江近现代各个时期出版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国共等不同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出版路线、方针、政策,重要出版物,重要出版人物等方面。近现代浙江出版业所处的时代背景纷繁芜杂,因各个时期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同,出版业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注意把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本书主要供浙江文化事业的爱好者阅读,对于从事出版文化和出版史研究的相关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1894~1949 / 陈矩弘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3361-8

I. ①浙… II. ①陈… III. ①出版业—文化史—研究
—浙江省—1894~1949 IV. ①G23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5190 号

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1894~1949)

著 者:陈矩弘

译 者: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武汉梅苑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31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7—65652277



前 言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有着悠久的文明和辉煌的出版历史。早在北宋时期，杭州就已经成为我国雕版印刷的三大书业中心之一，雕版工艺之精良堪称全国之冠。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德国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早了约 400 年，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极大贡献。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杭州不仅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文化教育中心，也成了当时全国的刻书中心。杭州的官刻、私刻和坊刻都比较发达。当时杭州的书坊，仅从鼓楼至众安桥一带，就有 20 多家，其中最有名者为陈起在杭州棚北大街开设的陈宅书籍铺。元代全国出版中心北移，浙江刻书虽不及宋代之盛，但仍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之地，所刻图书质量属全国上乘。元代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创建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西湖书院，其所刊刻的《文献通考》刻印精美，为元代刻本之代表作。明代前期，浙江出版业一度沉寂，至明中叶以后，浙江出版业再度兴盛。除各路、司、府刻书外，私刻和坊刻也相当繁荣。这一时期，浙江湖州家刻异军突起，其中以闵齐伋和凌濛初两家所刻双色和多色套印本最具特色。这是出版印刷工艺的一大进步。清初，大兴文字狱，浙江刻书业一度衰落，至乾隆后期浙江刻书业才渐次复兴。同治六年(1867)浙江书局成立，这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出版机构。浙江书局因为有一大批学者型的编辑人员把关，因而所刻图书质量上乘，涌现了不少精品图书。

晚清至民国初期，浙江传统的刻书业仍然比较发达。宣统元年(1909)，浙江书局并入浙江图书馆后，继续雕印了不少书籍，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西泠印社，也刻印了不少印谱书画类精品图书。晚清浙江私人刻书业也颇为兴旺，大量郡邑丛书与方志得到刊行。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私人刻书机构有刘承干的“嘉业堂”、张均衡的“适园”、吴昌绶的“双照楼”、蒋汝藻的“密韵楼”等。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西方列强在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和商品倾销的同时，也展开了文化侵略。他们通过创办教会、学堂，办刊、办报和创办出版机

构等名义,向中国民众进行宗教渗透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在出版宗教读物和近现代科技、教育书刊的过程中,也把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出版理念带入了中国,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瓦解和向近现代出版业的转型。

辛亥革命前后,浙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革命书刊,如《武风鼓歛》《越社丛刊》《农友会刊》《舜社丛刊》《妇女旬刊》等。这些刊物均采用石印或铅印出版。民国初年,浙江各地书刊印刷厂所相继设立,新式出版逐渐取代传统雕版印刷成为浙江出版业发展的主流。

民国成立之初,全国的出版中心转移至上海,因浙江毗邻上海,不少有志人士奔赴上海创业,创办了多家全国闻名的出版机构。当时全国著名的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均为浙江籍实业家创办。许多浙籍人士也在上海众多书局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浙江一批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先后创刊了《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新乡人》《新塍半月刊》《曲江工潮》《宁波评论》《火曜》《甬江潮》等一大批进步期刊,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号角。民国初年,浙江出版机构除了官办的国民出版社、正中书局杭州分局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全国著名的民营商业出版机构也纷纷在浙江开设分馆。这些出版机构主要出版发行新式教科书、文艺作品和科技著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浙江当局实行文化围剿政策,对进步出版事业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扼杀,浙江出版业一度进入低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团结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国民政府迫于全国民众的舆论压力,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浙江的出版业在抗日的枪炮声中顽强发展。抗战初期,随着杭嘉湖和宁绍地区的相继沦陷,金华、丽水地区成为全省战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大批文化人士云集金华、丽水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他们建立出版机构,印图书、办刊物、开书店,出版发行进步和革命的书刊,把抗日宣传搞得如火如荼。上海、杭州等地的许多出版机构也纷纷南迁至金华、丽水地区,出版发行抗战书刊。金华、丽水地区一时成为东南文化的中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浙江敌后根据地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出版了大量的进步出版物。

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浙江出版业,虽然所经历的时间不长,但在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却算得上是一个出版的大时代。这一时期,正是浙江出版业由传统雕版印刷向机器印刷过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传统雕版印刷业虽然日渐式微,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晚清至民国时代,浙江的雕版刻印事业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局面。同时,这一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浙江的新式出版业迅速崛起,各种新式出版机构纷纷创设。新式出版业与传统出版业并行发展,构成了

近代浙江出版业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上层建筑,总是受到其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浙江,时局动荡,各种政治势力粉墨登场,竞相角逐,各种新旧思潮剧烈碰撞,交相辉映。近代浙江的出版业也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环境中载沉载浮,既有过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也曾因遭国民政府当局的查禁而一度沉寂。国民政府当局对于书刊的查禁政策与进步政治、学术团体反查禁的斗争,始终贯穿着近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历程。

民国时期,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的出版事业,更是在困局中求生存、谋发展,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的出版发行机构如金华地区的新知书店、韬奋书店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为了获取出版所需的纸张,出版社人员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采购印刷用纸。在书刊发行工作过程中,书店发行工作人员靠手提肩扛,不分昼夜,不畏严寒酷暑,机智勇敢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随时冒着生命危险,把书刊送到广大军民手中,为抗日军民送上宝贵的精神食粮。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晚清至民国时期,浙江这块文化沃土哺育出了一批杰出的编辑出版大家,既有以传统雕版刻印事业闻名书业界的刘承干、丁丙、张均衡、蒋汝藻等众多刻书家,也有为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章锡琛、杜亚泉、张静庐、胡愈之、徐调孚、金仲华等近代著名编辑出版家。他们以出版推动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以办好出版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孜孜矻矻、兀兀穷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近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他们以救世济民为毕生事业的崇高出版理念和为打造精品出版物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高尚出版情怀,永远值得出版后人铭记和学习。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观照过去,还可以启示未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引以为傲的丰硕出版成果。在为浙江出版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近代那些为浙江出版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出版先辈们。正是他们对于出版事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开创性工作,才奠定了今天浙江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浙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1
第一节 晚清浙江社会的变迁和出版多元格局的形成	1
一、晚清浙江社会的变迁	1
二、晚清出版多元化格局的初步形成	3
第二节 晚清来华传教士在浙江的出版活动	5
一、《中外新报》《甬报》和《德商甬报》的创办	6
二、出版印刷机构的创办	7
第三节 晚清浙江维新派的出版活动	8
第四节 晚清浙江革命派人士的出版活动	10
一、《杭州白话报》等革命报刊的创办	11
二、《浙江潮》的诞生	13
第五节 晚清浙江官书局的出版活动	15
一、浙江书局的创设及刻书背景	16
二、浙江书局刻书数量和内容特色	17
三、浙江书局刻书兴盛的原因分析	19
第二章 民国初年浙江出版业的崛起	2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浙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出版业	21
第二节 五四时期浙江期刊出版业的繁荣	24
一、五四时期杭州创办的主要刊物	24
二、五四期间浙江其他各地创办的重要刊物	33



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1894—1949)

第三节 民国初年浙江的雕版印书业	39
一、张均衡刊刻《适园丛书》	40
二、周庆云编印《梦坡室丛书》	41
第四节 嘉业堂主刘承干的刻书活动	41
一、刘承干和嘉业堂藏书楼	42
二、刘承干的刻书活动	43
三、刘承干刻书的特色及意义	51
第五节 朱遂翔和抱经堂书店的书业活动	52
 第三章 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浙江出版业	55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浙江文化出版业发展概况	55
一、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浙江出版业发展背景	55
二、国民政府初期浙江书业的兴盛	58
第二节 国民政府文化“围剿”和进步出版界反“围剿”的斗争	60
一、《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的颁布	60
二、进步出版工作者反文化“围剿”的斗争	61
第三节 鲁迅、茅盾等浙籍文化名人的编辑出版活动	65
一、鲁迅的编辑出版活动	65
二、茅盾的编辑出版活动	70
三、郑振铎的编辑出版活动	74
四、邵洵美的出版活动	76
第四节 大江书铺等革命进步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	80
一、陈望道与大江书铺	81
二、胡风书局	82
三、明日书店	83
四、光明书局	84
五、神州国光社	85
第五节 西泠印社的出版活动	87
一、西泠印社早期的出版活动(1913—1923)	87
二、西泠印社出版事业的繁荣(1924—1936)	89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出版业的兴衰	92
第一节 抗战时期浙江出版业发展概况	92
第二节 抗战时期金华、丽水、温州地区出版业的繁荣	96
一、浙江战时文化出版中心——金华	96
二、抗战时期丽水出版业的繁荣	106
三、抗战期间温州地区出版业的发展	111
第三节 抗战进步刊物《浙江潮》的出版	114
一、严北溟与《浙江潮》	114
二、《浙江潮》的主要内容	115
三、《浙江潮》的编辑和作者队伍	116
四、《浙江潮》的读者工作	118
第四节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业	118
一、中共浙东区党委的成立和进步刊物的出版	119
二、浙东韬奋书店等进步出版机构的成立	125
第五节 抗战期间浙西地区的出版业	127
一、抗战初期浙西出版工作的开展	127
二、抗战中期浙西出版工作的高潮	131
三、浙西民族文化馆的设立	134
四、抗战后期的浙西出版工作	136
第六节 抗战期间国民党对浙江进步出版业的查禁	137
一、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构的设立	138
二、图书杂志查禁活动	140
三、进步出版工作者反查禁政策的斗争	141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江出版业	143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出版业的恢复和发展	143
一、期刊出版业的恢复和发展	143
二、出版机构的恢复和重建	146
第二节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	152
一、《四明简讯》的出版	153



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1894—1949)

二、《浙东简讯》的出版	155
第三节 路东、路西地区的出版工作	156
一、路东(会籍)地区的出版工作	156
二、路西(金萧)地区的出版工作	157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南出版业	159
一、《浙南周报》的出版	159
二、浙南的木刻出版活动	160
 第六章 浙江近现代出版家传略	163
第一节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辟草莱者”——张元济	163
第二节 自学成才的近代出版巨擘——陆费逵	168
第三节 胸怀大志的书业界经营奇才——沈知方	172
第四节 “开明”的出版实业家——章锡琛	176
第五节 近现代书业界的“出版霸才”——张静庐	180
第六节 为进步出版事业奔走呼号之人——胡愈之	184
第七节 近代科技编辑的先驱——杜亚泉	189
第八节 编辑出版界的一代楷模——徐调孚	194
 附录 浙江近现代出版大事记(1894—1949)	199
 参考文献	219
 索引	226
 后记	235



第一章 晚清浙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晚清浙江处于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中。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纷纷入侵，浙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和发展。随着国外传教士进入浙江传教并创办出版印刷机构，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兴起并广泛开展文化出版活动，晚清浙江出版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新式的机器印刷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而居主导地位，浙江出版业由此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

第一节 晚清浙江社会的变迁和出版多元格局的形成

清朝统治后期，统治阶级极其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日薄西山的同时，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这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海外扩张，抢夺别国的资源。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洋枪重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不可避免地遭到欧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并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一、晚清浙江社会的变迁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均战败，被迫与欧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42年8月，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中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随后中国又被迫同欧美等国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主权开始遭到破坏，欧美资本主义侵

略势力逐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开始向中国东南沿海等地进行渗透，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

浙江的半殖民地化首先是从宁波开始的。自宁波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贸易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洋布、毛呢、洋油、鸦片不断输入中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浙江自然经济瓦解的进程逐渐加快。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浙江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20世纪初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变革潮流。在这变革大潮流的席卷之下，清朝政府不得不顺应时势，由过去的“重农抑商”转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了专以“保护开通”工商业为宗旨的商部，制订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保障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如《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浙江地方政府也贯彻了朝廷的旨意，开始“提倡商务”、“振兴实业”。1904年（光绪三十年），浙江省建立了农工商矿局，这是浙江省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管理农工商实业的政府机构，标志着清末浙江当局开始把发展近代农工商实业作为政府的重要事情来对待。该局1908年改设为劝业道，并且制定了一个《浙江省劝业公所试办章程》，规定劝业公所的职责是“管理全省农工商矿及各项交通事宜”。浙江地方政府的这一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20世纪初，浙江各地纷纷掀起创办实业的高潮，各种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兴起，与全国其他各省区相比，近代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金融业比较发达。无论是鸦片战争后钱庄业的兴起还是20世纪初年商办银行、地方银行的兴办，均处于全国前列。1907年10月，浙江首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成立。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除了为浙路公司服务外，主要为经营各种存款、放款、汇兑和贴现等业务。兴业银行是浙江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较早成立的商业银行。它成立后，不仅为浙江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并且对浙江的实业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浙江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民族和民主意识也开始觉醒。在20世纪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正在觉醒的资本家为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和政治权利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与国内封建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20世纪初的浙江，资产阶级开始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社会变革的浪潮开始席卷全省。这股变革浪潮首先由经济领域展开，进而向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领域发展。在这股改革浪潮的裹挟下，浙江地方政府不得

不进行一些改革,开展了“新政”和“预备立宪”活动。浙江的新政首先是从兵制改革开始,进而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各地纷纷创设新式学堂,实行新学教育。据统计,至1905年,全省共创办各级学堂306所,有学生13 175人。至1909年(宣统元年),学堂数增至1 990所,学生数增至77 530人^①。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尤以赴日本留学的最多,成为一时热潮。1901年浙江留日学生有39人,至1904年达到191人,1905年第一批由省学务处派赴日本学习师范的官费留学生就有100人^②。这些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学生和留学生群体与旧式士人相比,对世界大势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因而有着更为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再加上“戊戌”以来的“兴西学”潮流的冲刷,庚子后民族危机,国内政治风云的刺激,使他们的思想意识——从政治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③。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们成为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

二、晚清出版多元化格局的初步形成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学东渐尤其是教会出版事业的兴起,清代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出版体系开始受到冲击,传统的出版格局发生改变。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出版事业和洋务派的翻译出版事业并起。这些出版机构的相继建立,为中国出版界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出版思想、印刷技术和近代企业管理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逐渐改变了中国出版业官、私、坊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迫使传统官办出版和民间坊刻对此作出回应^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为配合政治宣传,两派纷纷创刊办报、著书立说,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更加精彩纷呈,出版格局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除了前面所述外国传教士、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所从事的出版活动外,清政府的官方出版活动也呈现出发展态势。1907年,以清政府出版的《政治官报》为标志,全国各省纷纷创设政府机关报刊。《浙江官报》《浙江教育官报》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地方政府官报。

《浙江官报》于清宣统元年(1909)五月在杭州创办,由浙江省官报局主办,属省巡抚管辖。《浙江官报》为16开周刊,内容包括谕旨类、奏折类、文牍类、函电类、法

^① 根据《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编各章数字统计。

^② 杜亚泉.各省游学汇志[J].东方杂志,1905(6):202.

^③ 汪林茂.浙江通史(第10卷,清代卷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④ 元青,王建明,王晓霞.中国近代出版史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令类、论著类、调查类、表式类等。此外,还刊载一些广告。1909年第6期刊登的《绍兴、诸暨县近三年禁烟表》,对清朝末期浙江一些地方种鸦片、吸鸦片、销鸦片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统计。1911年(宣统三年)第6期所刊登的《钦定报律》,可谓中国有史以来内容最详细的新闻法。

《浙江教育官报》为清末浙江教育行政机关刊物,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创刊于杭州,由浙江学务公所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为5日刊。该刊编印有关学务要件,凡谕旨、部文、章程、规则、批行、准驳各件,悉行刊登。该刊从栏目设置到文章编排,均十分严谨庄重。例如,该刊对浙江全省学校的分布情况、师资配备、学校规模等,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名单和学科,以及欧美各国对外国留学生的规定、学费等都做了如实记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刊改为《教育周报》,1919年又改为《教育潮》,出版双月刊、月刊。1919年4月出版《教育潮》第1期,1921年1月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10期。该刊出至第6期时,曾一度停刊。1920年10月复出的第7期,思想内容上相较以前更为保守,提倡“国粹”,反对新思潮,因而遭到进步文化界的抨击,最终该刊以“经济困难”为由而被迫停刊。

除了以上地方政府创办的官方机关报刊外,这一时期浙江地方行业性报刊也纷纷涌现,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包括商业、农工、文教、医学、工艺等。《著作林》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创办于杭州的一份文学性刊物,由陈蝶仙(天虚我生)创办并任主编。自第12期后增加主笔潘少文(双吟楼主)、留月山人、讷庵居士等。该刊由“著作林月刊社”编辑发行,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并入《国闻日报》,共出版22期。前16期为石印本,自第17期起社址迁往上海,改铅印本。所刊文章多为落魄文人、失意政客、隐退官僚之作品。刊内特辑的《艺苑同光录》《诗界同人录》《诗家一览表》是研究清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游戏世界》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在杭州创刊,该刊是当时全省唯一的一份游戏刊物,钟俊文(寅半生)任主编。该刊由杭州崇实斋书庄出版,游戏世界社发行,月刊,木刻线装本。该刊内容以诙谐杂文、旧体诗词、戏曲为主,兼涉文学论文、时评,也辑录一部分文艺小报的文章。终刊时间不详,共出版发行18期。

《绍兴医药学报》由神州医学会绍兴分会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创刊。主办人为绍兴中医裘吉生、何廉臣,由绍兴医药研究社总发行,社址在绍兴府城宣化坊。办刊宗旨为“于国医学之足以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以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之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勦绵力,力谋进步或亦社会卫生之一助,医界改良之嚆矢欤”^①。该刊在上海、苏州、潮州、天津、杭州、宁波等地设有代售处,并远销至南洋各岛及日本。民国十二年(1923)停刊。

^① 引自《绍兴医药学报》第1号,发刊词。

《农工杂志》是清末浙江地方开明士绅创办的一份宣传改良、提倡实业的刊物,清宣统元年(1909)正月创刊;由浙江农工研究会编辑发行,杭辛斋任主编;月刊,32开,册式,每册约116页,出至第6期后停刊。该刊以“开通民智”和“研究农工实业改良进步”为宗旨;设有图画、上谕恭录、社说、奏议、公牍、专件、调查,以及浙江特别之物产、浙江特别之创造、农工之新发明、最宜输出国外之农产品、农工新政、农工纪事、译述、政要等栏目。《农工杂志》关注民族农工实业的振兴和发展,反映民间疾苦、人民的呼声和要求。该刊刊载了多篇浙江省经济调查方面的文章,包括各地物产、制造业分布情况,关于农桑、制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还刊登清政府关于“农工新政”的改良政策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刊登揭露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境况及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横行不法、奸淫妇女、掠夺烧杀的种种罪行的文章。该刊社址设在杭州佑圣观巷,宁、绍、温及京、津、沪等地设有分售处。

《杭州商业杂志》是浙江创办的最早的商业期刊,清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由杭州商业公会创办,周庆云任主编。该刊为月刊,每年出10期,每期100页左右。其办刊思想为“处此商战剧烈之时代,欧风美雨息息相通,其不可不与全国相见,且不可不与全球相见也明矣,是故编杂志者,必具有世界之观念,而后可以论一国之商业;读杂志者,亦必具有世界之观念,而后可以论一国之商业。不知全球,不能论一国;不知一国,不能论一处”、“商业杂志,宜于切实,不宜于虚浮,宜于精当,不宜于泛博”。该刊所设栏目有社说、杂录、杂报、调查、谭丛、会务报告等栏目,每期刊有广告,终刊时间不详。

晚清出版格局的多元化,不仅体现为从事出版活动主体的多元背景,而且表现为出版物种类的多样性。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类型不仅有综合类刊物也有众多的专业性刊物;既有以介绍时政类为主的刊物,也有专门介绍某一具体行业的刊物。总之,在晚清浙江出版业中,传统雕版印刷与新式机器出版、官方出版与民间出版、守旧刊物与革新刊物、综合类出版物与专业性出版物一起,构成了晚清浙江丰富多彩的出版图景。

第二节 晚清来华传教士在浙江的出版活动

炮舰、商品和洋教,是西方资本主义用以打开中国壁垒的三合一手段。在两次鸦片战争时,不少西方传教士或以侵略军的随军教士身份,或兼充翻译、商人等,纷纷踏进中国大门,乘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定海、宁波、镇海等地组织教会、建立教堂,从事传教布道的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浙江是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



一、《中外新报》《甬报》和《德商甬报》的创办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再加之国民长期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天然的抗拒心理,传教士单凭聚会演讲的方式传教收效甚微。为此,他们开始调整传教策略,通过采取建学校、办报纸、出书籍、设医院、创办出版机构等,加强对中国民众的宗教渗透和思想宣传。两次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在浙江创办的主要报刊有《中外新报》《甬报》和《德商甬报》。

《中外新报》(英文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是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之一。创办人为外国传教士兼医生玛高温,咸丰四年(1854)十月创刊于宁波。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每期8页1册,活字排版,竹纸印刷,边框界栏,黄色封面。该刊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戒”,“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实际上,该时期由外国传教士创刊的报刊大多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摇旗呐喊,充当喉舌,他们以传教为名,极力向中国人民灌输“精神鸦片”,宣传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合理性”的舆论。

《中外新报》所报道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方面,既有国内重要城市如宁波、上海、广州等地的政治经济动态,也有日本、新加坡、欧美等国的政治、经济、商情消息,信息传播辐射面极广。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国人获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情况和科技知识,了解世界大势。《中外新报》出版后,行销全国,远涉日本、英国等地,为中国首批外报之一。该刊于咸丰十一年(1861)出至第11期停刊。现大英博物院收藏有该刊于咸丰五年(1855)出版的第2卷及稍后出版的第3、4卷原件。

据1881年2月19日出刊的《万国公报》第672卷载有“新出甬报”消息一条,称《甬报》于1881年2月(光绪七年辛巳正月)创刊,在宁波出版,由英国牧师阚斐迪邀宁波人李小池创办,慈溪徐漪园任主笔。该刊为月刊,是文言文刊物。现存13卷,是从创刊号开始的全年合订本,因光绪七年有闰七月,故全年为13卷。该报刊为16开大小,书册式,用赛连纸单面对折铅字印刷,每卷8张16页,装订成册。所载内容涉及面广,记述洋务运动在宁波的活动,披露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的状况,反映当时中国边境四面受敌、危机四伏的局势,也传播西方一些科学技术知识。

《德商甬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9)十月由德商德丰洋行创办,该报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商业报纸,因而该报的最大特点是商业性与服务性。从报纸的编排上看,整张报纸分为4栏,每期广告和市场行情占很大比例。前者占1~2栏,后者占1栏以上,体现了商业报纸的特点。《德商甬报》称得上是浙江最早的商报。

二、出版印刷机构的创办

西方来华传教士除了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基督教和新教的宣传外,还纷纷建立出版机构,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鸦片战争期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出版机构,其中规模较大、最为著名的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书馆和广学会。

美华书馆前身为 1844 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设立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 年迁往宁波。1858 年,传教士姜别利(William Gamble)被派往宁波担任书馆负责人。他把新的铅字和字模带到了中国。1859 至 1860 年间,姜别利发明了用电解法铸造汉字字模的新方法,其方法是先用黄杨木做字坯镌刻反体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然后将阴文铜字模锯开成一个个单字,镶入黄铜壳中。这种电镀字模相比以前的手工字模,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工,而且字形更加完美漂亮。此外,姜别利在印刷史上的另一项贡献是发明了新的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字盘。他将汉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并用实木制作排字架,将汉字字模分类依次排列,正面放 24 盘,中间 8 盘是常用字,上下各 8 盘装备用字,左右两旁 64 盘均盛放罕用字,并将这些字架置入“元宝式”(又称“三角架”、“升头架”)字架之中。每类字均依《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于字架上。姜别利发明的排字法极大地提高了汉字取字速度。姜氏所制的排字架在排印圣经时颇为便利,但在排印其他出版物时却不太适用。1909 年,商务印书馆对此进行了改革,按照铅字的使用频率重新排列了汉字字模,提高了报纸书籍的排字效率。1960 年,花华圣经书房由宁波迁至上海,改为美华书馆。姜别利与美华书馆的最大贡献在于改进了汉字活字印刷技术,对清末民初正处于脱胎换骨的中国近代印刷业的革新起了巨大的作用。传教士们所从事的出版活动,虽说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对中国近代出版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欧美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亚洲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亟须扩张海外市场。为了攫取更多资源,日本把侵略目标瞄准了邻近的朝鲜和中国。1894 年 7 月(光绪二十年六月),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和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造成中国惨败的结局。1895 年 4 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在日本马关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除规定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等外,其中第六款规定:中国向日本增开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四处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1896 年 9 月 26 日,杭州正式开埠。随着宁波、杭州等一批城市的纷纷开